

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 ——罗蒂的社会希望

陈安慧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罗蒂从语言的偶然性出发展开对传统镜像哲学的批判,并设想了一个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作为社会未来之希望。这种文化中的理想成员是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他们既渴望最大限度地实现私人创造,又能以“我们”意识促进公共团结。罗蒂相信,只要能区分私人领域的语汇和公共领域的语汇,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就有实现的可能。罗蒂的设想招致许多非议,这些非议都忽视了罗蒂提出设想的初衷和目的,罗蒂的初衷是强调理想的社会中不应该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威资源来作优劣之分的评判,他的目的是促使人们放弃对超验事物的追求,转而追求俗世的幸福。

关键词 罗蒂;偶然性;反讽主义者;公共领域;私人领域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首席代表,后现代思潮的主要理论家,被誉为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哲学家之一。罗蒂的学术生涯长达近 40 年,著作颇丰,许多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影响波及全球。罗蒂先后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对哲学史和当代分析哲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并受到良好训练。毕业后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后出任弗吉尼亚大学凯南人文讲座教授,1998 年后又转到斯坦福大学任比较文学系教授,从教经历显示出其学术研究领域的广阔,但他的主要兴趣和关注对象仍是哲学问题,讲课内容依然关乎哲学。

一、背弃镜像哲学

使罗蒂一举成名的是《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一书,此书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提出全面的质疑,引起西方哲学界的极大震撼。他声称这本书是反哲学的。传统哲学把心作为一面巨镜,从最初的希腊哲学追求“智慧”起,到康德使这种思想形成范式,哲学关切的就是要准确地再现心以外的事物,真理就是心灵中的信念同外在世界的事实相符合,这种哲学始终认为存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

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变化的知识系统。罗蒂反对这种逃避历史的自欺行为,相信知识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因而罗蒂赞赏杜威对哲学的改造。杜威认为传统哲学轻视实践、脱离行动、推崇不变而摒弃变化,他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就是要关注人的实践和行为。杜威指出“实践的领域是一个变化的领域,而变化则总是偶然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机遇的因素”,^①由此驳斥了传统哲学寻求确定性的做法。除杜威外,奎因、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等人都是罗蒂赞赏的反传统哲学者,罗蒂深受他们的影响。另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给了罗蒂极大的启发,进化论摧毁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等传统理论,论证了生物是可进化的,生物进化的动力是自然的选择。罗蒂评价说:“达尔文使我们绝大多数人相信,我们是意外聪明的动物”。^②罗蒂与这些学者站在同一阵线,他不仅摒弃了确定性,还以偶然性为切入点展开了对镜像哲学的批判。

罗蒂对偶然性的论证始于语言的偶然性。罗蒂与当代美国分析哲学代表人物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语言观一致。戴维森拒绝把语言视为再现或表现的媒介,撇开了这样一种观念:实在界和自我具有内在本性,且这种内在本性等待被认

收稿日期 2012-1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文学批评”(07BZW005)

知。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是一种因果的演变,而非对内在本性的无限趋近。当原本使用的语汇相互干扰,就会有新的语汇被创造出来,新语汇可以提供一套先前未曾有过的特殊描述。但创造新语汇的因果力量都只是些随机因素,比如罗蒂说亚里士多德创造“实体”一词、圣保罗创造“圣爱”一词、牛顿创造“引力”一词都可能是宇宙射线扰乱了他们大脑中若干重要神经细胞的结果,也就是说语言的演变得益于许许多多纯粹偶然的机缘。新语汇与旧语汇一样都是对世界的隐喻而不是再现,人们创造新的语汇是因为这个新语汇恰好比以前的语汇更适合某一特定的目的,无论是科学的新语汇对自然的不断重新描述还是文化批判的新语汇对历史的不断重新描述,其实都是新的隐喻代替旧的隐喻的过程,而不是对内在本性的洞识。这样罗蒂就提出“思想史即隐喻史”的观点,认为“这个世界并不具备任何判准,供我们在不同的隐喻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只能把不同的语言或隐喻彼此相互比较,而无法把它们拿去和一个超越语言的东西——‘事实’——相比较”。^③

由语言的偶然性罗蒂进一步推论出自我的偶然性。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正如尼采和弗洛伊德否定普世的道德意识,罗蒂也认为道德意识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间和机缘的产物,个体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超越偶然来成就普遍性,而在于承认偶然以成就自我创造。只有承认个人经历过的独特的偶然,才能为自己的独特性找到独特的语汇,才能找到自身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沦为复制品或仿造品。

由语言 and 自我的偶然性出发,罗蒂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承认偶然性的自由主义社会。在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中不残留任何神的遗迹,人们拒绝向任何非人的力量负责,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承认他们用来陈述最崇高希望的语汇,乃是偶然的——他们自己的良知乃是偶然的——但却还对他们的良知忠贞不二”。^④承认偶然正是对我们继承而来的“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需求”的抛弃,因而自由主义社会没有哲学基础,有必要用新的语汇对其重新描述,以涤除旧语汇落在它身上的残渣,那些旧语汇都是为适应旧时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已不适用于描绘新的自由主义社会。

这种新的自由主义社会就是罗蒂设想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其中的文化正是罗蒂背弃传统镜像哲学后设想的后哲学文化。后哲学文化将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在其中,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建立在实践之外的标准,此标准可以

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符或是否与真理相符,“在这样一个文化中,仍然有英雄崇拜,但这不是对因与不朽者接近而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作为神祇之子的英雄的崇拜。这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是那些知道一个(大写的)奥秘的人、已经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⑤在这种意义上,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十分接近于利奥塔定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因为它们都表现出对理性主体、绝对精神等元叙事的怀疑和抛弃。但罗蒂认为“后现代主义”一词被很多学者用来表现政治上的无望,而他坚信社会可以进步,所以他更喜欢将这种后哲学文化称为“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

二、自由主义者与反讽主义者

罗蒂把设想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中那些承认偶然性同时也坚持良知的人称作“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liberal-ironists),他们是自由主义者和反讽主义者的结合。

罗蒂对“自由主义者”的定义来自朱迪斯·史克拉尔(Judith Shklar),指那些相信残酷乃是我们所作所为中最为糟糕的事的那些人。“反讽主义者”则被罗蒂概括为“认真严肃地面对他或她自己最核心信念与欲望的偶然性,它们秉持历史主义与唯名论的信仰,不再相信那些核心的信念与欲望背后,还有一个超越时间与机缘的基础”。^⑥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希望人类的苦难会减少,人对人的侮辱会停止,但对于“为什么不要侮辱?”、“你如何决定何时为正义而奋斗?”之类的问题不会有一个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答案。为了使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的轮廓更清晰,罗蒂描述了这样两位人物:福柯和哈贝马斯,前者是一位不愿成为自由主义的反讽者,后者是不愿成为反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福柯从尼采那里学到了避开超历史的观点,也和尼采一样放弃了对无时间性的起源的追求,他致力于对偶然性的系谱学叙述,因此是一位反讽主义者。但他认为自由主义社会给其成员加上了种种束缚,且拒绝承认这些束缚有效地减轻了人类的痛苦,所以他不能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哈贝马斯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由“无宰制的沟通”(domination-free communication)来达致意见的会合,从而在更民主的氛围中变革公共制度和政策,以避免人类的残酷。但他不相信语言的创造性,认为语言揭示的任何事物都要通过世俗实务来检验其有效性,认为民主社会应该体现出一种普遍主义和理性

主义,这与反讽主义者秉持的理念格格不入。罗蒂认为自己与福柯的差别是政治上的,与哈贝马斯的差别是纯粹哲学上的,他们都不是乌托邦中的理想社会成员,一个人只有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反讽主义者才能成为理想成员。

罗蒂对反讽主义者着墨颇多,显然他相信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件难事,毕竟大多数人都会避免残酷,但成为反讽主义者就需要对承袭的习俗与所在时代之间的冲突有更多的反思。反讽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与形上学家(metaphysician)的对立。形上学家相信在表象背后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有,他们坚持,重要的是什么是真的,而不是使用什么语言,语言只是工具,并且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那个唯一“正确的”终极语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这个语汇形成的各种哲学理论编成一个系统,使它们会合一致,在整体上逐步趋近对实在的精确再现。反讽主义者则是怀疑主义者,不相信“正确的”终极语汇的存在,虽然她置身于自己使用的一套终极语汇中,但“(一)由于她深受其他语汇——她所邂逅的人或书籍所用的终极语汇——所感动,因此她对自己目前使用的终极语汇,抱持着彻底的、持续不断的质疑。(二)她知道以她现有语汇所构作出来的论证,既无法支持,亦无法消解这些质疑。(三)当她对她的处境作哲学思考时,她不认为她的语汇比其他语汇更接近实有,也不认为她的语汇接触到了在她之外的任何力量”。^⑨所以,当形上学家以逻辑论证的方式进行哲学探讨,即从一个命题推论到另一个命题时,反讽主义者以辩证的方式将不同的语汇进行比较和对照,用创造出的新语汇来重新描述对象,以期对实务做出一个改变,而不是去发现一个事实。当形上学家强调人类与一个伟大的力量,如上帝、真理或理性,关联在一起,因而有着共同的本性和普遍的道德性时,反讽主义者坚持认为,批评一个终极语汇的只能是另一个终极语汇,没有任何超越语汇的判准。

反讽主义者被许多人谴责为不负责任,甚至构成威胁,他们利用新语汇进行的再描述可能会把自我和世界描述得落伍过时或毫无意义,由此带来侮辱。罗蒂的看法是,形上学家也从事再描述的工作,但他们是打着论证的幌子进行再描述,理性的论证使得听众觉得自己在接受教育,认为正确的再描述使他们更趋近自由,于是经过再描述后他们感觉自我的力量增强了。反讽主义者之所以遭受谴责是因为反讽主义者的再描述无法解释为何自己的再描述比原来的好,因为他们对形上学家所说的

伟大力量不知所以,他们无法给出形上学家呈现的那种社会希望,无法增强力量,他们坦白说,得到自由的机会要视历史的偶然而定。这样的反讽主义者有反自由主义之嫌,如哈贝马斯批判的,他们对普遍性和理性的批评会瓦解自由主义社会成员间的紧密关系。那么一个人能够同时既是一位反讽主义者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吗?

三、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何以可能

自由主义者与反讽主义者能否合二为一的问题关系到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能否可能的问题,罗蒂乐观地相信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指出问题的答案在于区分再描述的目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

从柏拉图试图回答“为什么正义符合个人的利益?”开始,大写的哲学就一直企图将公共与私人融为一体,于是出现了“共通的人性”、“普遍的道德”、“绝对的真理”等概念,形上学家的终极语汇中就没有了公共和私人之分。形上学家认为自己的语汇对公共目的和私人目的都适用,或者说,他们认为形而上的公共修辞必须在自由主义者个人的终极语汇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这个公共的修辞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是团结的基础。然而以上这些概念是承认语言、自我和社会的偶然性的反讽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反讽主义者总是希望从继承而来的公共修辞中摆脱出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终极语汇,从而创造出最佳的自我,这属于为私人完美而进行的再描述,与公共行为毫不相干。但同时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她的终极语汇中与公共行为相关的那个部分,会要求她警觉自己行为中侮辱他人的种种可能性,在这种侮辱有可能发生时,不要被自己的终极语汇局限和蒙蔽。在反讽主义者看来,团结的基础不是公共的修辞,而是对人类共有的危险的感受,即人人都会有屈辱的感觉,因此,如果能够在公共领域避免侮辱他人,那么每个人拥有各不相同的终极语汇,是根本无所谓的。按照罗蒂的这一思路,只要区分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使一个人既是反讽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是有可能的。

既然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是可能的,那么罗蒂设想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也是可能的。在这个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都是反讽主义者,非知识分子也开始接受自我的偶然性,唯名论和历史主义成为常识。这个社会,凡经自由讨论得出的结果就是“好的”或“真的”,与其它更伟大的东西无关,“真理”一词不代表一种永恒的秩序,而“仅只是对那些成功地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

事务的信念所添加的无意识的和空洞的赞词而已”。^⑧罗蒂反复强调,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语汇,而且最好不要有将它们统合的打算。在实践上,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可以有许多可行的措施,使社会成员既能按自己的喜好成为私人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同时又不伤害他人。“但是,要在理论的层次上将自我创造和正义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自我创造的语汇必然是私人的,他人无法共享,而且也不适合于论证;正义的语汇必然是公共的,大家共享的,而且是论证交往的一种媒介”。^⑨我们不需对两种语汇采取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应等量齐观,将它们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如克尔凯郭尔、尼采、普鲁斯特、海德格尔、纳博科夫等人属于自律作家,是追求私人完美的典范,他们告诉我们自我创造、自律的人生是怎么回事;马克思、穆勒、杜威、哈贝马斯等是正义作家,他们作为社会公民的表率参与社会任务,努力使社会制度和实务更加公正无私、更少残酷暴虐。两类作家都言之有理,在成熟的自由主义社会中他们的言论可以并行不悖,但没办法要求他们说同一种语言。罗蒂提到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曾颇为赞赏地引用乔瓦尼·帕皮尼对实用主义者的描述,帕皮尼把实用主义比喻为“就像是一家旅馆里的一条走廊。众多的房间向它敞开。在一个房间里,你可以发现一个人正在撰写美学著作;而他的邻居正跪拜着祷告神灵;第三个房间住着一位化学家,他正在研究一个物体的属性……他们全都拥有着这条走廊,并且所有人都必须穿越这条走廊”。^⑩这未尝不能理解为罗蒂对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描绘——房间里从事私人创造,走廊上处理公共事务。

自由主义乌托邦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平等的机会尽情发挥才能来从事自我创造,但同时也不会如哈贝马斯担忧地那样忽视成员间彼此的关系。他们会通过扩大“我们”意识,把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他们”包含到“我们”的范围中来,以减少侮辱和残酷,朝向更广大的人类团结的方向发展。这种“我们”意识并不是形上学的普遍意识,罗蒂觉得“自由主义社会是依靠哲学信仰而结合在一起的说法,似乎非常可笑”,^⑪他坚持反哲学的立场,声称把“他们”视为“我们之一”的基础是人们在感受痛苦和侮辱方面的相似性,把“他们”视为“我们之一”的过程是重新描述他人和自己的过程,这个任务的承担者不是哲学或宗教论文,而是民俗志、记者报导、纪录片、尤其是小说中对各式各样苦难和侮辱的详细描

述,所以团结不是在论证中发现的,而是在再描述中创造出来的。由此可推断罗蒂认可私人的再描述最终能成就公共的团结。

四、罗蒂的困惑与希望

罗蒂将反讽主义者与形上学家的对立,与伊哈布·哈桑将反讽与形上学对立是一脉相承的,但哈桑把反讽视为“激进自我消耗的游戏、意义的熵”,^⑫其意义的混乱和不确定对应社会的混乱和不确定,罗蒂则把反讽划归私人领域,认为反讽主义者的作品不适合公共的目的,这样罗蒂就避开了反讽为社会带来虚无主义的危险。但罗蒂描绘的反讽主义者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抵牾。罗蒂声称反讽主义者意识到了语言的偶然性和判准的约定性,因而也意识到了语汇更改的可能性,也因而不会一本正经地对待自己身处其中的那些语汇,苏珊·哈克撰文反驳道:“我毫不犹豫地反对这样一种巧妙的暗示:非反讽主义者只是一些毫无趣味可言的正经人。”^⑬哈克相信,承认语言革新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绝不是罗蒂的反讽主义者的特权,反而罗蒂的反讽主义者更像是一些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犬儒主义者,因为他们并不认真对待可能需要进行的修改,而只是强调对这些语汇或判准是否为真的追问没有意义。詹姆斯·卡因洛克则指出,罗蒂的反讽主义者只以一个描述对另一个描述作比较,而不是与某个对象作比较,并且还宣称不存在判断两种描述孰优孰劣的中性标准,结果是“我们也无法对各种探索方法作出谁优谁劣的区分,我们无法谈论知识的进步,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科学的进步”。^⑭不可否认,按罗蒂的设想,反讽主义者永远不会承认我们对实在有了更好的掌握,所有的改变都只是词汇的改变。若果真如此,那么该如何解释人类对地球板块结构的确定、登月的成功、对DNA结构的绘制等一系列对自然实在的探索 and 发现?这些的确是罗蒂设想的反讽主义者中消极的一面。但同时我们要理解,学者们对反讽主义者的抨击走的是迂回路线,避开了罗蒂强调的主要特征,而对反讽主义者的次要特点发起攻击。罗蒂从没有说反讽主义者是没有缺陷的,反讽主义者不把现存语汇当真,的确有些犬儒主义的味道,但反讽主义者是欢迎变化的,只是他们“并不把科学探索或其他任何一种探索看作是以真理为目标的探索,而是看作对更好的辩护能力的探索,看作……来更好地应付我们正在讨论的事物的怀疑的探索”。^⑮所以反讽主义者否认的不是进步而是否认存在一个确定不

变的力量、一个大写的真理。

罗蒂更大的成就在于,在其他理论家忧虑后现代文化瓦解形上学后可能带来信仰崩溃、社会丧失凝聚力时,罗蒂设想了一个后哲学文化,即他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后哲学文化中私人的反讽与公共的自由主义是分开的,反讽主义的流行可能会削弱自由主义社会,也可能相反,会加强自由主义社会。罗蒂当然倾向于后一种设想,因为他相信,在反讽主义流行的自由主义社会中,如果人们对公共的修辞有所怀疑,他们不是像苏格拉底一样苦苦追问定义和原则,而是学杜威,用具体的计划和选项来应对,他说:“据我推测,这种文化不论在自我批判方面或在追求人类平等的诚挚上,比起我们目前所熟悉的、依然形上学的自由主义文化,若非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是无分轩轻的”。^⑥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是罗蒂为后现代文化设想的出路,也是罗蒂为西方哲学设想的出路,罗蒂因此而享誉思想界。

可是罗蒂最让人争议的地方正是在这设想的出路之中。首先,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否认事物具有本质,这种文化寻求的是实用而不是真理。罗蒂的恩师哈茨霍恩质问:“罗蒂的如下说法极其简明地表达了他的态度,我们处理事情不是通过知道它们是什么而是通过‘应付,仅仅是应付’它们而已。对它的一个回应也许是,昆虫也能应付得很好”。^⑦很显然哈茨霍恩想强调的是,人类了解事物是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就像苏格拉底苦苦追问各种德性的定义,是为了探求到绝对真理从而引导人们向善,更好地生活。所以罗蒂的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超验维度的全然的缺失,这种缺失使罗蒂的自由主义乌托邦没能走出后现代文化的困境,罗蒂的乌托邦仍然面临信念缺失的问题,面临在应付世界时放弃了意义、尊严、神圣性等人的内在精神的问题,这是很多学者的担忧。

其次,自由主义乌托邦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截然分开,两个领域使用两种不同的语汇,这种截然的划分是否可能?个人能否撇开社会独立地创造自我?社会能否面对个人的极大发展无动于衷?马克思指出人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孤立地存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⑧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是纯粹私人的事情,必然是社会环境的存在造就独特的个人。反之亦然,一个人的私人立场和活动不可能完全不对他的公共行为产生影响。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这样质问

罗蒂:“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一位讽刺者,真的为关于她的最终语汇的‘激进而持久的’怀疑而苦恼,这种怀疑的影响仅限于书房内的这种假设还存在任何理由吗?”^⑨罗蒂无法回答这类问题,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论述,私人的再描述能促进公共的利益,这就与他的公私不能统合的前提相矛盾。他又不愿推翻将公共与私人领域分开的想法,因为他不愿推翻他的整个乌托邦构想。这正是罗蒂的困惑所在。另外,罗蒂倡导的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分似乎仅停留在话语层面,罗蒂说:“自由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是:若只涉及言论而不涉及行动,只用说服而不用暴力,则一切都行(anything goes)。”^⑩若果真如此,实用主义哲学所关注的实践和行动如何体现?

罗蒂并不能对所有问题都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在罗蒂的困惑以及由此导致的我们的担忧中,笔者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以去粗取精的方式理解罗蒂乌托邦的精髓要义,他说“愿意接受为个人差异提供最大空间的自由主义目标通过如下共识而得到了推进:除了人类的自由同意以外,不存在其他的权威资源”,^⑪也就是说,他强调的重点是理想的社会中应该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威资源来评判个人间的差异有何优劣之分或某个人的追求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同时公共正义的推进是成员间通过讨论达成共识的结果。他的哲学目标是促使人们放弃对某个非人类事物的追求,转而追求俗世的幸福。

罗蒂无法为我们提供一套完美的政治哲学方案,我们也不能要求任何人给予我们完美的哲学方案。罗蒂对关于自己的批评作出过回应,说他关注的是世界之未来的希望,要用希望取代苏格拉底同样以反讽来苦苦求索的超验知识。他的目标就是通过指出传统哲学的可疑之处,在批判中带领社会走向新的希望。他的希望就是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并且他对这种文化的到来充满信心。虽然他的哲学设想中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但不可否认经他设想的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对差异有更大的包容性,也因此使团结更具稳定性。社会正是在探索和讨论中进步,探索没有尽头,哲学也不会终结。

注释

①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②⑩⑬⑲ 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28页,第82页,第67-68页,第364页。

③④⑥⑦⑨⑪⑮⑳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

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页，第69页，第6页，第105-106页，第5页，第122页，第124页，第77页。

⑤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⑧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页。

⑫ Ihab Hassan. *Paracriticisms: Seven Speculations of the Times*. Urbana,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 55.

⑬ 苏珊·哈克：《粗俗的实用主义：一种无益教化的见解》，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哲学家对批评家的回应》，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6页。

⑭ 詹姆斯·卡因洛克：《什么是工具主义的遗产？罗蒂对杜威的诠释》，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哲学家

对批评家的回应》，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3页。

⑰ 查尔斯·哈茨霍恩：《罗蒂的实用主义及告别信念和启蒙时代》，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哲学家对批评家的回应》，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2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页。

⑲ 威廉姆斯：《罗蒂论知识与真理》，查尔斯·吉尼翁，大卫·希利主编：《理查德·罗蒂》，朱新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责任编辑 王雪松

Ironic Liberal Culture: Rorty's Hope for the Society

Chen An-h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 Richard Rorty criticizes the traditional mirrorlike philosophy by presenting the contingency of language, and then proposes an ironic liberal culture as the hope for the future of the society. The ideal members in this culture are those called liberal ironists, who are eager to maximize their private creation and also can promote public solidarity through the sense of "us". Rorty believes that as long as we separate the private vocabulary from the public vocabulary, the ironic liberal culture could be possible. Rorty's idea causes a lot of criticism which ignores Rorty'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purpose. Rorty's original intention is to emphasize that in an ideal society there should not exist an absolute authority resource as a judge for better or worse. His purpose i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pursue the earthly happiness instead of transcendental things.

Key words : 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ist; public sphere; private sphere